

173670

基本品類

誰說現在不如从前

社会主义教育参考材料第二輯

55/0
2872;2
下2

四川人民出版社

誰說現在不如从前

——社会主义教育参考材料第二期

☆

四川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成都状元街20号

四川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号

新華書店四川分店發行 四川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 24頁 • 1 1/2印張 • 36,000字

1958年5月第一版 1958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000 定价: (5) 1角2分

統一書号: T3 118 • 40

編書人的話

去年秋季到今年春天，在工礦和農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从羣众里涌现出大量的、对廣大人民羣众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教材。这些教材，使人們生动具体地認識到：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新中國；社会主义有無窮的优越性，資本主义只能給人們帶來深重的災難。从而提高了人民羣众辨别是非的能力，拥护社会主义的正气，压倒了資本主义的邪气，在社会主义覺悟提高的基础上，出現了空前的生產高潮。

但是，人們頭腦中的資本主义思想并未徹底根除，社会主义道路徹底戰勝資本主义道路，特別是社会主义思想徹底戰勝資本主义思想，將是今后長期的任务。因此，这些教材不僅在过去對人們起了巨大的教育作用，就在今後繼續向人民羣众進行社会主义教育时，仍有很大的教育价值。現在，我們選擇了一部分，把它編印成冊，供工厂、農村、學校進行社会主义教育时的參考。

選編的文章，挂一漏萬，不免有差錯，請讀者批評指正。

一九五八年四月

目 錄

黃大光的“苦”在哪里？	(1)
母子論战	(5)
夫妻間一場論战	(6)
在辯論会上	(8)
駁倒了“解放后沒翻身”的謊話	(9)
苗家已出头，擺脫苦与愁	(11)
共產党比爹娘还好	(13)
幸福花开南河社	(14)
三筆賬，算得好	(16)
对联寫得好 驚醒夢中人	(18)
讓实物說話	(19)
展覽会上	(23)
新旧社会相对比 天堂地獄見分明	(24)
当了三朝老百姓 只有今天才幸福	(27)
三个对比	(29)
想从前，看今天	(30)
山区生活的变化	(31)
白毛女翻身当模范 紅太陽照亮断头山	(31)
旧社会把好人逼瘋 新社会瘋子变好人	(35)
解放前有口难开 解放后啞巴說話	(36)
唐兴發忘本回头	(37)

黃大光的“苦”在哪里？

——內江史家區區、鄉、社干部會議上批判
黃大光的忘本思想

一付对联

內江縣史家區區委會的牆壁上，貼有一付引人深思的对联。上面寫着是要把它送給黃大光。

上联是：“想从前，撿柴又撿糞，茅草棚棚住了几十載，生活苦难無人問，你忘記了？”下联是：“解放后，分田又分土，高房瓦屋住起不搬家，日子越过越香甜，还不知恩？”

究竟黃大光是什么样的人呢？原來他是一位很年青的小伙子，今年二十二歲，出身在一个貧農家庭里，从小就过着辛酸、苦楚的生活。解放后，他家翻了身，分了田地，参加了順江農業社。他当上了順江社的隊會計。他担任了共青团史家鄉团总支副書記的职务，并且入了党。象这样一个農村青年，應該說是青年人中的好榜样了。但是，事情却出人意料之外。

黃大光訴“苦”

1957年9月下旬，史家區召开了一次區、鄉、社三級干部會議，开展農村中兩条道路的大辯論。黃大光在这次會議上，竟然惡意地攻击党、攻击合作化，說出許多沒有良心的話來。他說：“这些話悶在我心里有三年了，我要把它們全部倒出來。”接着，黃大光就訴起“苦”來：“解放后的生活不如解

放前好，我外侄餓得來舐瓢兒，我父親臨死前連米湯都沒有吃一口，共產黨壓迫人民比過去反動派還凶。共產黨的心偏到一邊去了。”他還自欺欺人的說：“我自小來就是靠着米糠子長大的，從來沒有過過象現在這樣的生活。”黃大光“放”出來以後，有的幹部因為不了解他家的真實情況，對他深表同情。但是，了解他家情況的人都感到激忿和痛心。紛紛起來和黃大光辯論。

鄰居們擺真情

順江社黨支部書記高培成首先揭開他的底子：“黃大光，我們兩人住在一個鄉，又是鄰居，從小在一個地方長大，你受的苦我知道，我受的苦你知道，誰也瞞不了誰。你不想想，從前你是什么光景？解放前，你家是上無片瓦、下無寸土的赤貧，用‘千柱落地，萬担生瓜，四十八口天井，七十二道衙門’，來形容你家的房子，是一點也不誇張的。”

高培成說到這里禁不住問道：“知道黃大光家的同志們，你們說，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是呵，地馬兒（老鼠）打架也把他家的房子震得垮。”史東鄉團總支書記高長成這樣回答。

高培成繼續對黃大光說：“你還記得不？有一年，你家正在煮包谷湯巴吃，忽然一陣風吹來，把房子刮得吱吱直響，你媽喊你爹‘老漢，快把鍋吊起’，你爹又直叫小女兒。結果，吊鍋還是震倒了，茅草房也刮得七零八落的。沒奈何，你們只得去哀求地主，地主不給你們想辦法，最後還是我們幫助你家把茅草房重新搭起來，你難道忘了？說實話，你家從前住的茅草房還比不上今日順江社的糞棚哩！前幾天，我又去問過你的媽，她提起這件事情眼淚還直滾。你應該好好想一想，究竟是今天好還是過去好？你父親在解放前被拉了七次壯丁，當了三

十年長工，最后，被人打成一個傻子。你的哥哥也幫了七年的長工。你呢？十三歲時就幫地主蒲朝暉干活，那時連背篋都背不起，娘兒兩抱头痛哭了一場。這難道就是反動派的好處嗎？現在你當上會計、俱樂部主任，1957年初還到成都作農業展覽會的解說員，見到了朱德副主席。這些事情你怎么就記不起了？共產黨鬥爭了三十年，把我們從火海洪坑中救出來，你怎么就忘恩了？我可以下這樣的結論：拿你從前的生活和現在對比，簡直象孫悟空打筋斗一樣——相差十萬八千里。你說你現在的生活比黃連還苦，我說你現在的生活比蜂蜜還要甜十分！”

這時，劉志章也起來同黃大光爭辯：“黃大光，你說你解放前沒有借人的褲子穿，這是胡說。我就親手借過褲子給你穿。解放前有一年，你戴頂破濫的沱沱帽，披一件蓑衣，冷得打抖抖，我才在孫刀把那里借了一件衣服給你穿，你怎么昧起良心說沒有？”

增產增收是事實

譚雍全接着說：“順江社從1954年成立以來，年年增產，1954年糧食畝產五百五十九斤，到1956年糧食畝產就達到九百七十三斤，去年糧食畝產達到一千一百斤，比1954年增產一倍。再說甘蔗的增產情況，1954年甘蔗畝產七千一百六十二斤，1957年甘蔗畝產達到一萬斤。黃大光說高級社不如初級社，初級社不如互助組，互助組不如單干農民，完全不是事實……”，黃大光這時還插嘴說：“我家就沒有分到那么多糧食。”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順江社主任鄭文和，叫在這裡參加會議的小會計孫澤成當場把他幾年來的增加收入的賬打一遍。

小會計孫澤成早就氣極了，聽見鄭文和這麼說，連忙站起來，眼睛朝黃大光一瞪，說：“好嘛！我們就來當場算一算。”

接着就把賬簿抱來，啪的一聲放在桌上。這裡，我們不妨來看看黃大光幾年來的增加收入的賬吧。1954年黃大光家單干的時候，全年產糧食二千二百三十五斤，每人平均三百七十三斤糧食，總收入二百零五元。從1955年黃大光的家入社後，每年都獲得增產。1956年，他家共分了四千八百二十七斤糧食，每人平均分得糧食八百零四斤，總收入三百六十六元，比1954年單干時增加78%。1957年黃大光家總收入可收三百九十八元左右，比1954年單干時增加94%。小會計孫澤成氣憤地追問道：“這些增產的糧食都是你拿回家去的吧？該不是別人偷去了吧！”事實把黃大光駁得啞口無言。

駁兩項謊言

這時，劉盛榮站起來說：“黃大光，你說你的外侄兒餓得舐瓢兒，這不是事實。我就很清楚。你姊姊家給娃兒搞米糊吃，碗邊上巴一點米糊，你的外侄舐着好玩，連這一点点事情都被你利用來攻擊黨、攻擊合作化了。大家看看，黃大光哪點象黃皮寡瘦的樣子。”新下中農馮伯耀又接着說：“1956年3月，你姊姊家殺雞，把你的父親請去吃，他被雞骨卡住了喉嚨，回家後便吐血，不久就死去了。這件事情還有醫生劉玉林作証，你好意思說他餓得連米湯都沒吃一口就死去了？”碰巧劉玉林這天來趕場，也參加了辯論會。他馬上發言說：“你父親的病是我在醫，那的確是因為雞骨卡在喉嚨里死的。”

謬論全部破產

一個堅持說理的辯論會把黃大光的錯誤言論全部駁倒了。原來同情黃大光的幹部們，現在已轉變了立場，他們回憶起自己從前所受的苦日子時，有的在偷偷地揩眼淚，有的在罵黃大光是個忘恩負義的人。因為，事實擺得很清楚：解放前，黃大

光住的是破草房，穿的是襟襟吊吊，过的是被人欺辱的日子，流的是辛酸眼泪。解放了，土改时，黄大光分得了土地和大瓦房，全家人添制得一身新，他家的衣服重叠起来都要一間屋才放得下，每年都增加了收入。解放前后的生活呵，真是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獄，相差得很远。

黃大光承認錯誤

但是，是什么原因使黃大光变成一个忘恩負义的人呢？大家認為，这主要是个人主义思想的嚴重發展，好了瘡疤忘了痛；同时他受到了地主、富農的思想影响，階級立場模糊了，因此昧着良心說假話。最后，黃大光也在辯論会上公开地承認了这点，檢查了自己的錯誤。他說：“我鬧党和合作化的一些話，是完全沒有根据的。說句良心話，我黃大光現在的生活不知比从前好多少倍，我穿一套、打一套、家里还存一套。原來兩個人都可以把家搬走，現在添制的衣服、实物把房子擺得滿滿的。再說，党給我的榮譽也很不少，从今后我要好好地工作，用实际行动來报答党。”

（原載“四川日報”）

母子論戰

1957年11月21日，在蓬溪縣黃泥鄉李文双社的辯論会上，大家对刘必光的錯誤言論展开了激烈的辯論。突然，刘必光的母親、50多歲的老大娘刘陈氏發言了：“我要反对我兒子刘必光說的‘我們的生活不如过去，毛主席不关心農民’这个錯誤言論。”她心情激怒，說起話來有些顫抖。大家的眼睛都盯在她身上。接着她憤憤不平的說：“不想从前苦，不知今日

福。我九歲時就当小抱媳婦。一提起那陣，我的喉嚨就說不出話來，眼淚水雙顆雙顆的往外滾。劉必光三歲時，就死了父親，那時家里日無逗雞之米，夜無鼠耗之糧，就靠我打草、推磨過活。沒有房子住，住了五個岩洞、兩個破廂。有一年，我兩母子住在張爺廂，沒有蓋的，冷得睡不着覺，睜着眼睛等東方發白。沒有吃的，揀人家的紅苕葉、油菜葉吃。這就是國民黨給我們的‘好處’！我們沒有土地，只有靠幫人挑抬過活。有一回，你跑到我面前說：‘媽！我們一輩子都這樣嗎？’我含着眼淚說：‘兒呀！你老子就是這樣過的一輩子！’我說完了話，你望我，我望你，互相抱着痛哭成一團。就這樣過了20多年，才等到解放。解放了，毛主席來了，我們翻了身，分了瓦房，又分了土地、農具，那時我就看到只有共產黨才是我們的恩人，日子一年比一年好。前年你結了婚，去年又生小人，你的女人吃了18個雞，400多個蛋，20多斤面，三升米的潑糟，40斤肉，8斤豬油，40天都是吃的干飯。当我生兒十個兒子吃的飲食。你兩口子每人有雙皮鞋，身上穿的是廣布，還有府綢，這些好日子沒有共產黨沒有毛主席你能得到嗎？還不及國民黨嗎？”她歇了口氣，看了看當場的人說：“現在他把過去的日子全忘掉了，我的兒子完全忘了本。”

（原載“蓬溪報”）

夫妻間一場論戰

1957年11月3日上午，西華鄉一大社11分社的社員們，在社辦公室里擺談着解放幾年來祖國建設的偉大成就和農村的新面貌。獨有新上中農任傳銀很久一言不發，後來他冒了火說：“你們說共產黨好，農民生活改善了，我說共產黨不如國民黨

好，農民的生活根本沒有改善。”他的話一落聲，會場上就鬧哄哄的。有的說共產黨打垮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人民翻了身，當家作了主；有的說，共產黨來了我們農民不受壓迫，青年人白天黑夜不立岩洞了；有的說，共產黨幫助我們組織了合作社，現在人人有衣穿，個個有飯吃。辯論了大半天，任傳銀還是堅持他的看法。這時，坐在他旁邊抱着一個白胖胖的小孩的青年婦女要求發言了。會場上鴉雀無聲，一雙雙眼睛都盯在這位青年婦女身上。她拍了拍身上抱的孩子，又激動又氣憤地說：“我叫龔加玉，是個青年團員，任傳銀是我的丈夫。我要和他講道理，把他的老底子擺出來。我和他結婚那年，家里窮得一棒棒打去擋頭都沒得，只有我兩個嫁奩櫃兒。他和我結婚穿的那套衣服，是看到結婚日子要到了，沒有穿的，忙到八村去做零工掙來的錢才縫的拜堂衣服。我听叔父說，任傳銀的父親，解放前在外面討口，住石溝灣的岩洞，死在別人坡上的一架涼床上，最后任傳松才去抬回家來。”說到這里，她氣憤地指着任傳銀說：“這就是國民黨好嗎？再說現在，屋里哪樣沒得，你頭上戴的呢帽子，你解放前沒有戴過。你現在穿的用機器打的衣服就是几套，頓頓有米吃。解放前我娘家十几口人沒有吃的，晚上沒有被子蓋，蓋蓆衣。解放后，50年我哥哥結了婚，建立起了幸福家庭，現在床上蓋的是花鋪蓋，有吃有穿，這能說農民生活不及國民黨時期好嗎？農民生活沒有改善嗎？”任傳銀想起解放前的苦日子，鼻子一酸，兩眼含着淚珠，望了望站在他面前的妻子和白胖胖的孩子，說：“我忘了本，現在的日子真的過好了，我是吃了菌子忘了挖兜恩。”

（原載“蓬溪報”）

在辯論會上

灯要撥才明

理要辯才清

辯論會开始了

我的發言出自我的良心

飲水要思源

翻身也不要忘本

今天鍋里煮上了白米飯

却忘記了你過去吃糠菜當頓

今天你床上蓋上了新被蓋

却忘記了你過去用蓑衣、谷草

遮身

今天你住上了新蓋的房子

却忘記了你過去住地主豬圈、

灰坑

今天你家老小團團圓圓

却忘記了過去妻离子散的時辰

今天你家照上了煤油灯

却忘記了你過去績麻、紡綫借

月度夜的光景

問題在哪里？

根源是什麼？

腦壳里的資本主義思想要挖掉

才行

不然！句句是給地主、富農幫

腔

說現在不如過去好……

未必要地主、資本家重新來奴

役我們

我想你也許不會贊成

全中國六万万人民更堅決不答

應

這一切一切你應該想通

我看你並不是一個糊塗的人

灯要撥才明

理要辯才清

辯論會开始了

大家都來發言

擺事實講道理

在光天化日下把“是非”辯清

(原載“南充增產競賽”報)

駁倒了“解放后沒翻身”的謊話

宜賓縣白遠鄉黃塔三分社共有農民50戶，其中老上中農32戶，新上中農3戶，兩部分上中農共占全社總農戶的70%。在上中農中較普遍地存在着“解放后不如解放前”、“解放后沒有翻身”的思想，這種思想以老上中農鍾少章、新上中農曹明海表現得最突出。他們說：“解放后政治上經濟上都沒有翻身”；“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明說沒有打罵，實際上比打罵還凶”；“生產隊長是長年頭，社員就是長年。”在整風運動中，該社召開了社員大會，專門辯論了這個問題。

在社員大會上，貧苦農民首先用自己親身的經歷駁斥了“解放后不如解放前”的錯誤言論。接着，了解鍾少章、曹明海老底子的老農民紛紛起來批判他們的錯誤思想。謝懷清說：“你鍾少章，解放前沒田沒地，有一年天干，缺吃的，就吃观音土，你女人就是吃观音土死的嘛！要借糧，借一石還兩石。解放后，你有田有地，有吃有穿，有房子，去年喂了兩條肥豬，這不是經濟上翻了身嗎？現在是我們掌握印把子，飯碗和槍杆子都在人民手里，有些農民還当了干部，難道這不是政治上翻了身嗎！”黃漢清搶着發言，他指着曹明海說：“曹明海，你也說沒有翻身，怎么不想想你家解放前是啥子光景喲！你家那時連几吊佃土的錢都沒有，你爸去抬滑竿、學石匠都顧不倒一家人的生活，硬起心腸，想把你媽賣了，已經說好50塊錢，後來有人勸，才各管各的生活……。”說到这里，曹明海很难堪，又不服氣，他帶着發抖的聲音打斷了黃漢清的話，說道：“你盡說這些過場做啥子喲！”會場嘈雜起來，許多社員憤憤地說：“你不讓別人說這些，是怕戳着你的痛處，你忘

了本，还是要教育你一下。”黃漢清接着說：“解放后，你分了田地，修了房子，有了皮鞋、新衣服，你怎不想想以前住的啥子房子呢？那时你家的茅草房，晴夜睡在床上看星星，落雨戴起斗笠盤脚坐，煮飯要防着天溝水漏到鍋里头。今天，你身在福中不知福，賣統購，你說象交地主的租一样，家里藏着兩簍麥子，还叫沒吃的，叫娃娃到处借，这是啥思想，是好了瘡疤忘了痛呀！”社員謝怀清接着說：“我看你的思想發了岔，忘記了是誰把我們从泥坑里救出來的，还想个人發財，走資本主义道路呀！”在羣众嚴辭駁斥下，鍾少章沒話說了，曹明海不得不承認經濟上的确是翻了身，但是他还不承認政治上翻了身，他說：“我們農民沒有文化，眼睛是黑的，政治上、文化上还是沒有翻身，刀把子沒有掌握在我們農民手里。”針對這個問題，羣众又和他辯論。有的說：“國民黨时代，只有地主官僚的娃娃才讀得起書，現在，光是我們社里就有40多个農民娃娃讀書，沒有解放，農民能送娃娃讀書嗎？”有的說：“金山殿村小学原來只有三、四十個学生，現在有三、四百学生，大都是農民子弟；社里三十歲以上社員大都識字了，这不是文化上翻身了？”这时，曹明海不开腔了，社員又追問道：“你說，我們社主任是什么成分？”曹說：“是貧農。”社員又說：“这不是我們劳动人民当家么？”曹辯說：“他虽是貧農，但沒有文化，掌握不倒政策，还是沒有掌握刀把子。”社員說：“社主任以前不識字，学文化很積極，执行政策沒出什么偏差，办事公道，真正是我們的帶路人，为什么还没有掌握刀把子呢？”曹明海又急忙改口說：“我不是說本社的干部，是說有的地主也在当干部，鄉上的余心寿是地主，还当干部。”社員說：“余心寿只是地主家庭出身，本人是学生，經過政府八年來的教育改造，才当上干部，替我們办事的。”曹明海又沒有話說了，社員又追問道：“你为什么說：社主任是地主，

保管是狗腿子呢？”曹明海說：“因为主任、保管把我們隊上的好麥子拿去上統購，把坏麥子分給我們。”社員說：“我們大家都分的是一样的麥子，你是想自己吃好麥子，把坏麥子給政府吧！”“要先有國家，后有自己嘛！國家把粮食拿去搞建設，使大家生活越过越好，你只顧自己是什么心腸呢？”

最后，鍾少章和曹明海都理屈辭窮，不得不在社員面前低头，說：“是我錯了，的确是政治上、經濟上都翻了身，解放前不比解放后好，我是忘了本，保証改造这种思想，搞好生產，和大家一道搞社会主义。”

苗家已出头，擺脫苦与愁

——筠連縣苗族副縣長國慶前夕談苗家生活

筠連縣是漢族和兄弟民族雜居地区，兄弟民族有苗族、彝族、回族，共1,720戶、8,306人，其中以苗族最多，共1,646戶、7,964人，都雜居在边远荒漠的高山地区。筠連縣的副縣長艾新華同志，就是苗族人。下面是他的談話記錄：

提起解放前的苗家生活，那真是沒法說。每年，苗家从野獸和狂風暴洪中搶种一点粮食，秋收一上坎，就被地主搶走了。从头年10月开始缺粮，直到第二年秋天。沒粮食，只好弄些野菜、樹皮來当頓。嚴寒的冬天，少数人能穿自己織的麻布，絕大部分苗胞甚至連麻布也穿不上。在政治上，苗家更沒地位。不僅不能过問國家大事，就連赶場也要受到反动派的欺侮和迫害。苗家子女从小就呆在家里做活，沒有上学的机会。

这样的生活，本來就不是人过的了。可是，反动派和地主們还經常加租、加稅、抓丁、拉夫，逼得苗胞实在活不下去的

时候，只好半夜帶着一家人踏着露水到一兩百里以外去避難，四处流落。苗胞把这叫做“打露水”。

过去苗胞“打露水”的很多，我家也打过露水。正当我七歲那年，父親活活累死在地主的地頭，母親頂着當長年，實在受不住那分苦，就在一天夜里帶我們“打露水”逃到云南，直到1948年才又回到家鄉。

解放后，苗家的生活变化真大，跟解放前比起来，那簡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党和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特别关怀。苗胞跟漢族農民一样分得了土地。國家又給苗胞發救濟款。几年來，發了34,000多元救濟款，2,500件棉衣。特别是党領導苗胞实行了農業合作化以后，苗胞的生活就起了根本的变化。大地鄉涌泉社51戶苗胞，解放前絕大多數連麻布衣服都穿不起，过年找不到年飯米。現在办了合作社，糧食問題全部解决了，大都有棉布衣服、鞋袜，过年还殺了30条肥猪。从全縣來看，情形也差不多，苗家沒吃沒穿的現象已經沒有了。

尤其是在政治上，苗家翻了个大身。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关怀，可說是無微不至，我就是全靠党的教育和培养，才能为大家服务的。几年中，党在縣里培养了12个苗胞参加縣区机关工作，22个苗胞当选了縣人民代表，苗胞鄉長就有10个，鄉人民代表中，苗胞有122人。苗胞也能过問國家大事了，再也沒有人敢來欺侮和迫害他們了。党和政府为了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專門办了兩所民族小学，还給少数民族小学生發被盖、棉衣、助学金。还有43个苗胞正在大学里學習各种科学、技術。

这些变化，在解放前都是根本办不到的，只有在共产党領導下才能办到。涌泉社苗家妇女說的好：“我們只有听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話，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办好合作社，搞好生產，來支援國家的社会主义建設！”这真是苗家的心里話。

（原載“四川農民”）

共產党比爹娘还好

南充都尉鄉火把社女社員 謝天秀

我們火把農業社，在江邊的壩上，有九百零一戶，田少土多，解放前既怕天旱又怕漲水。這兒流傳着這樣兩句話：“河壩邊，一季苞谷一季烟，大水來了就要喊皇天。”癸卯年漲大水，多少人被餓死了，有些討口叫化，各散五方。解放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打垮了地主，1954年就建立了農業社，在都尉鄉安上了抽水機，全社五千多挑田連年都滿栽滿插。1956年遭了大水災，但是社員積極搶種的結果，單位面積還是增了產。1957年小春比1956年增產百分之十八，大春肯定增產。拿苞谷來說，入社前每畝二百八十斤，入社后的頭一年就是三百三十六斤，1957年每畝是四百六十二斤，金皇后良種苞谷每畝收了六百斤。

社的副業也有了很大發展，去年養豬、養蠶共十項集體副業，收入二萬七千多元。單是養蠶一項就收入了八千多元，每張蠶種平均產繭量達三十公斤零二兩，出席了全國的勞模大會。由於副業發展的好，社員收入大大增加。

生活上，解放前我們農民一年辛苦到頭，吃的糠菜，穿的襟襟。過去還有這樣一個歌謠：“爹冷蓋蓑衣，媽冷蓋箆簍，娃兒冷蓋吹火筒”，“住的是風掃地、天點燈、九個天井的房子”。這是什麼情景！記得我二十二歲的時候，生第三個孩子，家里沒辦法，丈夫被逼去當兵。小孩生下來後，怕養不活，就硬起心腸讓小孩在地上冷死。這些事情想起來就寒心。解放了，有了共產黨的領導，辦了合作社，生活才一天一天的